



忆杨谦孚老师 巴中64年届 ——写作文字体潦草被扣分

巫颂寰，巴中64年届毕业生，他是巫公引老师的三公子，他勤于笔耕，曾在《巴中文苑》和《巴中会讯》发表诸多作品。他的父亲巫公引老师年轻时曾在梅县“广育”中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巫公引老师从上海“复旦”大学辍学南下回到印尼Jakarta协助其父经商，而本是书生本色不是做生意的“天资”，最终放去了生意经，於1958年由刘耀曾校长邀请下到巴中执教高中部的国文课，直到1966年巴中被封校。

2013年巫颂寰商务去上海和杨谦孚老师的儿子，既上海巴中校友会会长59年届杨远猷见面，畅谈往日校园趣事，品味人生，沟通情谊，一笑泯恩仇。

1964年度巴中毕业的同学们，相信都还记得我们高中二班时，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之中，有一位身材略矮肥胖的杨谦孚老师。

在记忆中杨老师是住在芒加勿刹第一街那一带，离我们母校校正校不远。有时我们骑脚车上学时，在芒加勿刹大街“快乐世界”附近就能见到一位头戴英国绅士遮阳帽的中年人，在一



步步地沿着人行道走向巴中母校。他就是我们的国文课老师杨谦孚先生。几位调皮的同学都会取笑杨老师，说他太土气了，怎么老是戴着这一顶荷兰殖民时期管农园殖民官儿的帽子来，也不知是甚么来由，他们都叫这顶帽子是TOPI CETOK，可能是用来敲顽皮同学的头时能发出“托、托”的响声吧！

杨老师的汉语修养造诣很好，英文底子亦然，听说早期也教过一阵子的英语。我读初中三时是在新校GUNUNG SAHARI那兒上课的。杨老师那时也是教我们的国文课。后来升到高中二时，也是杨老师来教我们的国文课。

杨老师教学颇认真，常常把中文课中新的词汇都写在黑板上，再一一地解释其含义及用词，並要我们同学们做笔记，有时还要来检查我们的笔记簿，同时经常查看

同学们上课时是否有带国文课本。若是有同学没带课本来上课时，不管是男同学或是女同学都要罚站直到下课。没带课本而罚站在课室中，该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呢！新学期一二个星期的教学后，再也没有同学们忘了没带中文课本的事了。学生们私底下都说这位颇具殖民色彩的“农园长官”管得我们好严，但也没有同学对他这一种从严管教而对他有所不敬。

杨老师教新课文时，是先把课文内容先作一个概要的讲解，把课文中人物作个描述介绍，才把文中的教育意义讲给我们听。然后，杨老师就把整篇的读文朗读给我们听，要我们好好地留意一字一句准确的发音。接下来杨老师就指定同学们轮流接替着把这一篇课文再重新地朗读一遍。我本人因为嗓子特别大，杨老师经常都会点名指定我朗读其中一段课文，自己也常常有受宠若惊之感，也为了保有这一份荣誉，自己经常都在新课文授课前，先作了一些对新课文的准备工作。

上作文课时，杨

老时有会给我们一道自由作文题，那时同学们都会认为这是杨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大恩典、大礼物。写作好的一些同学就可以趁机“捉刀”；替一些同学代笔交差。杨老师并非不知情同学间的这些作为，他一样地给那些特殊作文批了分数，但是却也故地选出了两三份这些“大作”在课室中朗读给我们听，好让同学们能一起来“欣赏”这些“大杰作”，这时我们大家都会互相地望着作出了一个会会心的微笑。我的字体向来写得最潦草歪斜，最不成体的，杨老师私下向我劝说了好几遍，要我写字写得更工整些，我自己也尽了力想把字体写好，但无奈因自己的个性太急躁，练习写字的底子不好，总是不能好好地在作文课时把字体写得端正些。

有一次作文批卷发回来时，却发现杨老师把我的作文分数扣了五分，作了一些批语：“字体潦草扣五分……”，还在同学们面前公布了一件从未有过的扣分大事，我那时真有一种颜脸扫地的感觉，认为杨老师怎么没给我一点“面子”，对他竟有了一中心怀不满的

情绪，真不想再去上他教授的国文课了。下课后，杨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桌旁，再次淳淳教导对我说，要我好好地把字体写好，将来到社会上工作，才能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当时我因还未消气就默不出声没有承诺。

学期快结束了，我们上了一堂最后的作文课，杨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我的老师”。我的心在起伏着，不知应该是写教我那一门课的老师才好？思考了老半天，结果却是提起了笔疾书：“我的老师，杨谦孚先生”批卷拿回来时，杨老师在我的作文卷的最后几行空白纸上，写下了几行评语：“在你还没有成为名人之前，你这样潦草的字是会被人非议的……”，真叫我永远不能忘怀！

离别了培育我们三十年的母校，而杨老师也在二十多年前逝世了，我心里还是感到很内疚。每当想起杨老师的教诲，直到今天我写出来的字体依然那么潦草，而自己在这社会上还是个碌碌无为的小人物，深感有愧于杨谦孚老师。